

弱关怀与娱乐化：“90后”大学生的政治心态特征研究¹

程浩然

程千里

唐俊超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郑雅君

郭巍蓉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探讨的是社会转型与互联网兴起背景下中国“90后”大学生的社会政治心态。基于对复旦大学等全国七所高校的1195份抽样问卷调查和1708名大学生微博用户的深度追踪分析，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的社会政治心态具有弱政治关怀、政治娱乐化等特点，并对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和互联网背景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如果经济发展出现长期停滞，“90后”相对于“00后”群体，二本、大专学生相对于一本、高职学生群体会出现更多不满。

一、 研究意义、问题和方法

九十六年前的5月4日，北京十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青年学生云集天安门，示威和游行队伍“火烧赵家楼”，拉开了这场救国存亡的爱国运动的序幕；八十年前的12月9日，北京大、中学校学生上街请愿游行，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大学生云集响应，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停止攘外必先安内、一直对外抗日”的学生运动。

然而，正是曾拥有丰富政治抱负与追求的大学生群体，在当今社会却似乎不再有如此高的政治关怀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剧烈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以学业为核心的个人生活使得当代大学生埋首于学业和就业之中无法脱身，大学生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天之骄子，成为了政治关怀普遍较弱的精英人才（张树辉，2002；袁潇等，2009；萧功秦，1998）。似乎很难想象这样一代大学生会像五四运动中的进步青年，或者是香港占领中环的学生那样，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大学生的政治心态曾被认为呈现“非政治化”（萧功秦，1998）、“冷漠”（张树辉，2002）。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大学生并非完全不关注政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理性化”、“功利主义倾向”的特征（肖莉，2007）。而近十年来互联网的信息爆炸，使得面对嘈杂政治声音大学生中出现了“政治娱乐化”的新趋势（高仁等，2014）。

我们认为，对下列三个问题的探讨能够对上述现象进行初步的解释：

问题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和个人生活风格的改变，如何影响了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问题二：大学生的弱政治关怀是受哪些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产生的？

问题三：互联网如何使得弱政治关怀转变为“政治娱乐化”？

为了对大学生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总体性的描述和分析，我们采用了混合方法进行大学生数据的收集。在向复旦大学等全国七所大学发放并回收了1195份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我们以大学-学生两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1708名新浪微博大学生用户，通过对样本所

¹ 通讯作者：程千里，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复旦大学文科楼924室，200433。本文初稿曾在由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主办的志德书院首届校庆学生学术报告会（2015年5月12日）上宣读，并被评为会议精品论文。桂勇、李煜等老师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文责自负。

发表的微博博文进行质性内容分析收集相关数据。此外，研究者还访谈了部分教师、学生，并在分析还采用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等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的调查数据。

本文的分析对象为以“90后”为主的当代大学生。在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较为全面的描述之后，我们将综合考量社会政治环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传统社会化媒介的变迁，以及网络这一新兴社会化载体对于大学生群体政治关怀可能存在的影 响，并尝试提出一个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解释框架。

二、弱政治关怀：当代大学生社会政治心态的主要特点

当代大学生大多出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独生子女”、“追求个性”、“功利”等历来是描绘这个90后群体的标签。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的社会政治心态主要体现为“弱政治关怀”和“娱乐化关注”这两大特征。

1. 弱政治关怀

首先，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关怀相对较弱，这体现在对于严肃的政治话题讨论和关注涉及较少。线下问卷显示，1195名大学生中(见表1)，最常使用的网站分别是社交类网站(关注群体占总体的83.3%)，娱乐类网站(66.8%)和新闻类网站(61.4%)；微博数据显示，大学生在网上最关注的问题领域是“生活”(78.5%)，其次是“娱乐”(61.6%)和“消费”(49.9%)；其最关注的与大学生有关的议题是“娱乐休闲”、“享受消费”和“两性关系”(关注群体分别占总体的56.5%、25.4%和18.5%)；可以看出，这些大学生几乎没有对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那些娱乐、消费等去政治化、个体化的领域。他们对社会上的公共议题的关注度也很低，基本不关注公共议题的大学生占到了总体的60.1%。其参与的微博话题与政治的相关度也较低，80.9%的学生的微博都与政治无关。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生(在 微博上)表现出全方位的弱政治关怀。

表1 经常浏览各类网站的大学生比例(N=1194)

网站种类	频次	相对频次
社交类	996	83.42
娱乐类	798	66.89
新闻类	734	61.47
专业类	230	19.26
政治类	71	5.95
政府类	51	4.27

2. 娱乐化关注

其次，当代大学生较弱的政治关怀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完全脱离了政治。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生们的社会政治心态出现了娱乐化的趋势。

表2 关注各类两会信息的比例(N=1193)

信息种类	关注人数	关注比例
八卦、奇闻异事、私人生活	567	47.45
两会新闻	505	42.33
大政方针	463	38.78
政府报告	289	24.20

大学生们在关注、谈论政治事件、人物的时候，倾向于采取娱乐化的态度，比如关注领袖的形象、八卦、段子等等。线下问卷显示，大学生们在关注两会议题时，对两会的轶事八卦、国家领导人的奇闻异事、私人生活等的综合关注度达到了47.4%，而对两会新闻、大政方针、政府工作报告的关注度则依次为42.3%、38.8%、24.20%；微博数据显示，仅有28.5%的大学生在讨论政治或公共议题时持严肃的态度，其余大学生或只是“围观打酱油”（25%），或“只转不评”（24.4%），更有15.7%的大学生持讽刺的或玩笑的态度。同时，在讨论政治话题时，大学生们除了诉诸个人价值观（25.0%）或个人经验（27.4%），以及完全转发（33.5%）之外，也开始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进行讨论，比如吐槽、黑话、玩梗等（5.6%），比例与诉诸专业知识（5.6%）和诉诸官方话语（2.9%）的比例相近。

三、社会经济变迁与互联网时代：一种政治社会化的解释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公民发挥政治影响、公民在社会中进行政治学习与政治体验的辩证统一过程，其本质要求是要塑造与一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人（赵长胜，2010）。一个国家年轻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必然包括培育其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性的政治关怀。探讨和分析大学生社会政治心态特点背后的社会机制，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于当代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讨论。

一个社会通过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四大媒介向客体（如年轻人）传递主导政治文化，而客体通过个人生活体验接受主导政治文化并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这便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制。可见，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行为；在具体分析不同媒介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之前，先有必要将“90后”大学生所处的社会变迁环境和青少年的主要生活特征和文化环境考虑在内。

1. “90后”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

（1）剧烈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

上世纪80年代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标志着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式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自此，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色彩逐渐弱化，代之以对市场和绩效的强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体制转轨引起了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剧烈转型。到90年代初，这些转型特征对社会生活带来的现实改变已经浮现，并且在“90后”的成长全过程得到不断强化：

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建立。市场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改变了原先以政治身份为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它激励人们以个人才能换取市场回报，以教育为代表的个人获致性因素逐渐成为地位获得的主导因素，社会流动的开放度增加（陆学艺，2004），教育机会分配的制度规则（学业考试为主）也更加公平化。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什么背景的个人，都有了通过努力去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可能。上述转变对“90后”及其家长而言，无疑是唤起有助于唤起其竞争热情的“兴奋剂”，各个阶层向上攀登的信心都获得了提升。在家家都忙不迭地为下一代的将来努力奋斗的时候，政治事务逐渐从人们目光的焦点中有点淡化。

社会整体流动机会的增加。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结构性流动机会的增加，而主要引起个体性流动的教育机会也在增加（陆学艺，2004）。这意味着生产水平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本身创造出了大量的职位空缺，使得该时期的社会成员有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而对于固有社会位置的流动，因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也使得更多受过教育的人较为轻松地就能实现向上流动——90年代的专科和大学毕业生仍然被看作高级人才。流动机会的增加进一步鼓舞了人们的个人发展效能，使得人们专注于市场竞争。

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功利教育观念。市场化的浪潮同样波及到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使人们头脑中传统的教育功能观变得更加现代化——将受教育看做人力资本投资，寻求最大的投入—产出比。抱着对知识的市场价值的选择性考量，人们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更

有针对性：哪种知识最有利于在学业竞争中获得优势，就专注于哪一部分，花力气在没有回报的知识上无异于浪费时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俗语正是这种面向市场逻辑的功利教育观的体现。

(2) 以学业为核心的个人生活

当社会环境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多教育机会和向上流动空间，社会选择过程全面转向市场取向的公平竞争机制，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文凭社会”（陆学艺，2004）。“90后”为代表的当代青年，恰恰处于这样一个“学习”的重要性无论是从文化意义上还是理性计算的角度都受到空前强调的时代：

“好好学习”的天然使命。从“90后”生活的文化环境来说，学习对他们而言从来不是一件陌生的任务。读书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意义，“学而优则仕”和“读书改变命运”的理想代代相传。教育成就对于中国人还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这是一种与亲族荣耀和门楣联系在一起的符号，一张稀缺的大学本科文凭被认为可以“光宗耀祖”。因此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好好学习”是他们天然的使命。

缺乏政治参与的校园文化。与美、日等国家不同，中国学校的校园文化某种程度上是“去政治化”的，学校之间升学绩效的激烈竞争使得我们的学校日程通常专注于教学，而通常少有对政治事务的实质性参与，一切不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为目的的事务都易被看做是无价值的。因此，学校没能为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实践提供适宜的文化氛围。

以学业考试为核心的单一社会选择轨道。从个人谋求地位上升的理性计算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历所代表的教育资本愈发成为地位获得的关键因素，而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则长期依赖单一的考试制度。高考被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正是这种社会选择机制特征的鲜活描述。这种独木桥似的筛选机制和单一的分轨模式给学生、教师和家长都带来极大的竞争压力，使行动者不得不带着处心积虑的理性算计投身到这个狂热的考试竞赛中来。在许多有名的高考强校，如衡水中学，学生的学习备考状态已经到了争分夺秒的地步，跟他们谈论政治关怀显得过于奢侈了。

这就是时代变迁加诸“90后”的客观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发现这个成长环境对培养青少年的政治关怀几无益处。在总体不利于有效政治社会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家庭和学校、同辈群体三大社会化机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互联网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 社会化过程下大学生的弱政治关怀

我们认为，由升学压力、生命周期和教育信念共同形塑的学生时代以学业为中心的生活，放大了社会化过程对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形塑作用。而近三十年以来剧烈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深刻地改变了家庭和学校教育这两个关键社会化机制中的政治观念，从而在内容上深刻影响了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形成。

(1) 家庭教育

这里所指的家庭教育，既包括父母，也包括父母的亲朋好友。一般认为，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早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对儿童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姚本先等，1994）。在大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亲朋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毫无疑问会深刻地改变孩子的价值观。

当代大学生的父母们大多是65年一代，他们完整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包括80年代末期的政治风波和90年代以来加速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迫使他们不得不把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既带来了大量新机遇和向上流动机会，同时还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流动机制，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主导（李强，2008）。在市场化浪潮中受益颇多的父母一代，往往养成了“努力就能成功”的坚定信念，身边同龄人的经历也为这一信念添砖加瓦。

(2) 学校教育

中国学生以学业为核心的生活，进一步放大了学校作为正式社会化的主要场所的重要性。

一名普通的中学生，每天8点上课，下午16点放学，至少8小时时间会在学校度过。如果是寄宿制学校，还将包括6:30开始的两节晚自修课程，有10小时左右的时间处于教学环境中。即使是回家的学生，还要面对大量的家庭作业。事实上，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12年（PISA2012）的数据显示，一个普通的15岁上海中学生，平均每天要花28.2小时在校内课程上，而要花13.8小时在回家作业上，分别位列全球第9位和第1位（沈学珺，2014）。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那么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深刻影响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又以怎样一种机制影响了大学生的社会政治心态呢？为了更好地进行解释，我们引入了三个中介因素，即内部归因、强发展效能与弱政治效能。

（3）中介因素：内部归因、强发展效能与弱政治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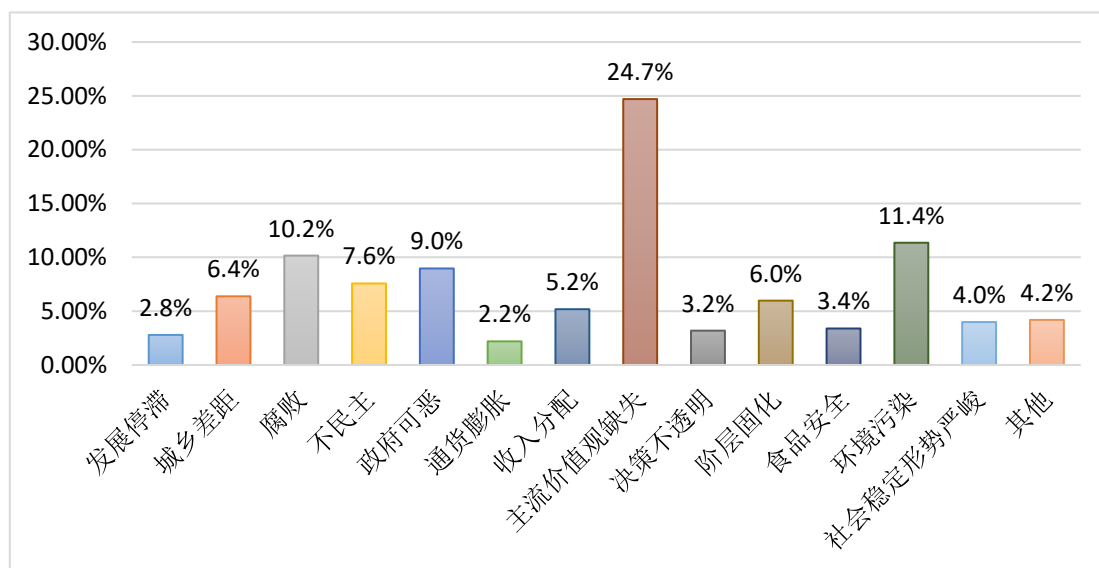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生认识中当代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

首先，当代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内部归因倾向。数据显示，24.7%的大学生将主流价值观缺失列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时，虽然有不少（27.89%）大学生将问题归因于制度，但最多（30.53%）大学生还是将最大问题归因于社会伦理、道德、文化。大学生较低的政治效能感和较强的内部归因倾向可能是父母的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内部归因逻辑的趋势下，失败对于大学生而言的作用仅仅是促进他们进一步努力，即使现在失败了，只要今后继续努力也会最终获得成功。而一旦他们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就会愈发相信“努力就能成功”这一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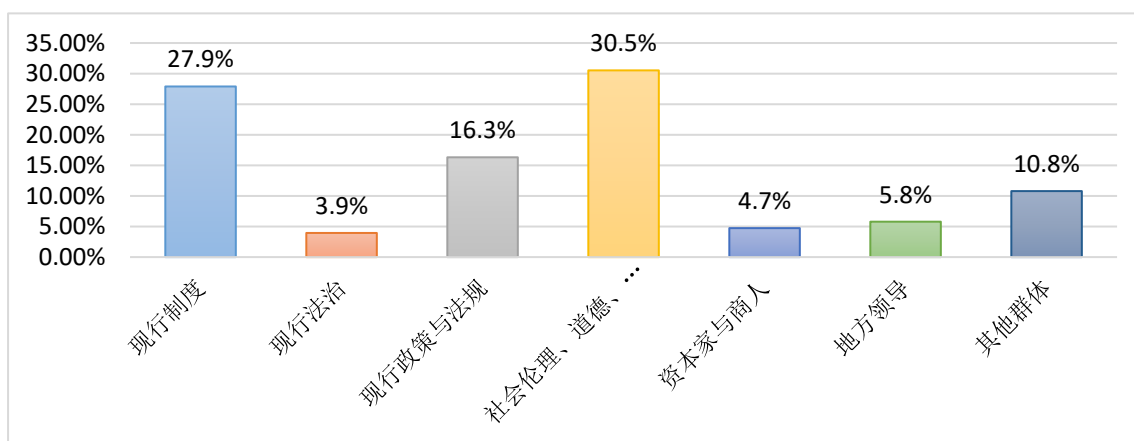


图2 大学生认识中对当代中国最大问题的归因

因此，大学生的内部归因倾向可以引申出第二个中介因素，即大学生的强发展效能感。所谓发展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发展的预期。根据数据，拥有强发展效能感（包括较强发展效能感和非常强烈的发展效能感）的大学生占到了总体的 90.1%。强发展效能感就是对自己未来的发展预期较高，认为有志者事竟成，努力就能成功。相反，弱发展效能感就是不看好自己未来的发展，缺少奋斗目标，或者认为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与强发展效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生们的政治效能感是很弱的。所谓政治效能感，指的是个人对于自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政治行动影响政治过程的信心。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信心，其次是个人是否了解政治系统并知道如何做出改变才是有效的。大学生心态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大学生拥有弱政治效能，占到了总体的 55.2%。大学生的弱政治效能具体表现为：对现有体制持消极态度、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选举持犬儒主义态度、认为难以改变社会现状等。数据显示，近三成的大学生对体制持负面态度（包括非常负面和倾向负面），占到了总体的 30.4%；对官方思想/意识形态宣传系统持负面态度（包括非常负面和倾向负面）的占到了总体的 72.8%；认为民主选举“无所谓”的占到了总体的 69.1%。

（4）家庭与学校教育的社会化作用机制

大学生的内部归因、强发展效能和弱政治效能主要是学业核心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变迁条件下家庭和学校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

父母一代的个人经历使得他们 1. 不会主动与孩子谈论或交流政治议题。大学生时事关注度调查结果显示，“经常”或“有时”与父母谈论政治问题的比例占 42%，58% 的学生从不或很少与父母交流政治议题（见表 3）；2. 在子女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或者政治参与的愿望时，希望他们不要过多地涉入其中；3. 不断向孩子传递“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并将孩子的不成功反过来归结为他们的不努力，加强了他们的内部归因倾向；4. 父母一辈的成功经历成为孩子的范本，加强了他们自身的对于“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5. 在以学业为核心的大背景下，父母往往倾向于将孩子的学业放到首位，而减少学生外出打工、参与社会实践等活动的的时间。现有文献也证明，教育年限对于个人未来的就业具有正面效应（王威海等，2012），这就使得子女更没有渠道去了解政治。

表 3 大学生与父母谈论政治议题的比例

频率	频次	相对频次
从不	127	10.67
偶尔	565	47.78
有时	383	32.18
经常	115	9.66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为学生的发展效能感和内部归因倾向提供了正面激励，对于政治效能感则带来了负面激励。从短期来看，中小学较为频繁的单元测验使得个人努力在短期内就能够看到成效；而从长期来看，学生的整个生活是以学业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旦学生升学成功，进入到优异的学校，就会实质上提升他的地位，他就能享有由一所好学校带来的赞许和声望。“努力就能上好学校”的理念、先例和经验深化了学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就感的信心。

考试激励和升学激励一起构成了发展效能感和内部归因的正反馈。从家长和社会环境中学生们相信自己能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学生们通过自己努力确实在学业上取得进步，这种进步本身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也更相信“努力就能成功”。这就造成了大学生的高发展效能感和内部归因倾向。与此相反，学校策略和同辈群体的影响则构成了政治效能感的负

反馈。对于学校来说，高升学率对于招生具有正面影响，而学生运动则不仅不会给学校带来好处，反而会给学校带来风险。因此学校往往希望学生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和考试上，而不会支持学生参与或讨论政治，这种举措无疑进一步降低了学生们原本就不高的政治效能感。同时，在班级里大多数人都讨论或参与政治的前提下，学生谈论或参与政治活动将面临很大的社交压力，因为他们可能被视作“奇葩”而被排除在主流班级群体以外，因此，许多学生出于维护社交圈的考虑，也不会再选择去谈论政治。这种服从于他人、改变自身的做法，又反过来降低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

(5) 作为结果的弱政治关怀

总之，大学生的内部归因、强发展效能和弱政治效能主要是学业核心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变迁条件下家庭和学校两条社会化机制作用的结果。并且，事实上发展效能会对政治效能起到“挤压”作用。大学生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发展效能，相信“努力就能成功”，并且与学校、家庭教育构成了一条正反馈机制。相较之下，大学生们政治效能原本就弱，还要在政治议题上处处碰壁，在学校、家庭间存在负反馈机制，甚至要承担不小的个人风险。两相比较之下，大学生当然会被“挤”到致力于个人成功的道路上去。正是前述社会化机制和中介因素的作用下，“90后”一代大学生们形成了“弱政治关怀”的特征。

正是上述强发展效能感和弱政治效能感共同导致了大学生的弱政治关怀。后者通过使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改变政治过程，从而使其自然而然地“放弃”关心政治；而前者则通过使大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更涉及切身利益的个人发展上，从而使其“无暇”关心政治。事实上，这种强发展效能挤压了大学生本应该有的政治效能，让他们觉得只要自己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并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么即使缺乏政治参与通道，他们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问题。更何况经济生活对他们来说才是近景，而政治生活是远景，因为后者没有涉及到其直接利益。

3. 互联网与社会化：政治娱乐化倾向

如前文所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升学制度、生命周期、教育观、家庭教育和个人努力观、归因风格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们本身就缺乏政治关怀，缺乏谈论政治的意愿和能力。而互联网的出现，则进一步加剧、扭曲了这一现象。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娱乐化倾向，是大学生具有的弱政治关怀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通过对上海、河南、甘肃等地有20年以上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进行访谈，我们了解到，在这些老师看来，整套以升学为核心的中学教育体制在过去的20年中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造成“90后”与“80后”等之前世代的人在中学阶段课余生活方式最大差异的原因，不在于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主导的教育改革或学业压力，而是在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与互联网技术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双重拓展。

埃弗雷特·罗杰斯通过对过往技术创新、推广的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创新的扩散遵循S形曲线的特点（埃弗雷特·罗杰斯，2002）。当某一项技术的普及率在10%上下时，开始会有一个普及率迅速提高的过程。自2006年以来，我国互联网普及规模超过10%，全面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据CNNIC的调查，自2002年至2012年，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从四千六百万增加到五亿六千四百万，增加了11倍。这一时期正是“90后”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最关键的小学与中学阶段的时期。21世纪以来，互联网硬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互联网深度与广度的不断扩展，使得互联网占据大量“90后”的课余时间成为可能，并极大地挤压了其他休闲生活内容的时间。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变化之一，互联网扩张对于“90后”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必然在“90后”的政治取向、价值观等方面表现出来。我们将在这一部分，展示互联网造成的对于“90后”生活方式和信息来源的变化，并将详细考察这些变化通过由互联网技术、网络环境决定的何等机制的影响下，对于政治取向、价值观造成的可能的影响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

(1) 互联网时代的主要功能

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信息状况报告》，2014 年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6.49 亿，95 后占比接近 1/4 (24.5%)，85 后与 95 后合计占比超过 56%，远远超过了 85 后人口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28%)²，在 1985 年-2005 年出生的人中，网民比例超过 95%。学生在网民中的比例高达 24%，基本与 95 后的人数比例相等。

2014 年我国网民的平均每日上网时间为 3.73 个小时，远远超过了我国居民每日读书的时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4)。有些对互联网充满信心的人预测，互联网将现实中的商业、社交活动转移到网络上，极大地降低了人际交往成本。那么，是否如同大多数对网络充满信心的人预测的那样，网络带来的变革主要集中在商业、科技、社会交往等领域，并将为这些领域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呢？

表 4 互联网使用最多的 17 种项目及其使用比例

	娱乐性		两者兼有		功能性	
	类别	使用率	类别	使用率	类别	使用率
高使用率	网络音乐	73.7	即时通信	90.6		
	网络视频	66.7	搜索引擎	80.5		
	网络游戏	56.4	网络新闻	80	网络购物	55.7
	网络文学	45.3			网上支付	46.9
低使用率			微博	38.4	电子邮件	38.8
			论坛	19.9	旅游预订	34.2
			博客	16.8	团购	26.6
					网络理财	12.1

注：数据来自 CNNIC2015 年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

如表 4 所示，相比商业、获取信息等行为，互联网用户更加关注娱乐方面的内容。网络音乐、视频、游戏、文学四大类主要的互联网娱乐方式使用率均超过 45%。而具有功能性的互联网商业，除了纯粹个人性的互联网购物和网上支付以外，使用率均低于 40%。被大多数人看好的互联网社交等也都表现不佳，网络理财等也都比例不高。虽然目前缺少更进一步的分年龄组数据，但是考虑到“90 后”步入职场的比例远远低于之前的世代，其对于互联网的商业应用的需求也应当远远低于其他世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90 后”的互联网使用更加强调娱乐性而忽视其功能性。即便是使用其功能性，也是着重于网络购物或网上支付这种个人性的功能性行为。

(2) 互联网时代以前的娱乐方式

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以前，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主要娱乐方式是在课间或课后、主要是在同班同学或是同一社区的同学之间进行的、以体力对抗为主的游戏，如丢沙包、打弹珠等。

此外，即使是看小人书这样以个体为主的智力活动，通常也是集体性的。经济因素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大多数的同学之间会相互交换、借阅漫画、小说。除此之外，看漫画书最有趣的地方不在于看书，而在于同龄人之间对此的讨论。通过近似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的共享，团体进入一种共情的效应，进而加深相互的了解和默契。通常来说，由于处在线下环境

² 根据 CNNIC 的数据计算，1985 年-2005 年出生的网民总人口应为 3.53 亿，但是按照我国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1985 年-2005 年出生的总人口数应为 3.73 亿，即使按照死亡率为 0 推算网民比例依然高达 95%，因此在采用这部分数据的时候有一定的可怀疑之处。

中进行这种讨论,有种种外部条件限制,因此这种讨论很少陷入强烈的、对抗性的意气之争,以讲道理为主。这就和之后的网络讨论行程了鲜明的对比。

表 5 互联网普及前后游戏方式的改变

	2006 年以前		2006 年以后	
	体力为主	智力为主	体力为主	智力为主
单人游戏 单人为主	看小人书	看电视 红白机、游戏机		单机电脑游戏 魔兽争霸等单 机、多人均可的 电脑游戏
多人为主	沙包、弹珠、贴画收集、 跳皮筋、踢毽子、打篮 球、踢足球、打群架、 跳格子、角色扮演、老 鹰捉小鸡、捉迷藏、红 灯绿灯停、乒乓球	粘纸、飞行棋等棋 牌	打篮球 KTV	CS 等网络竞技 游戏

注:表格中被人是在向全国 15 个以上省份超过 300 名“80 后”、“90 后”、“00 后”征集小时候游戏方式的问题后总结的结果。

(3) 互联网时代的娱乐方式及其后果

互联网普及之后,尤其是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网络普及以后,传统的娱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游戏方式而言,从传统的体力对抗为主的非技能型竞技游戏,转变为了以智力对抗为主的技能型竞技游戏。由传统的强调参与和随机性的非积累性的游戏,转变为强调技能的高积累性游戏。从参与者的角度而言,从原先的多人游戏绝对主导向单人游戏绝对主导过渡。即使是网络中“熟悉”的好友,也不了解对方的具体信息,对游戏伙伴的理解从现实中对象的多维度逐渐减少为游戏中语言风格、操作风格这样单一的维度。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而言,原先的游戏参与者往往两两相互认识,同一群体的成员的关系网络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叠的,这种重叠极大地加强了整个共同体内部的粘着程度;而在网络中的游戏参与者之间,很少会发生关系网络的重叠。这就使得社会网络的断裂非常容易,其社会化的功能也大大减弱了。

在游戏之外,阅读、社交网站、视频、购物等等娱乐方式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体力为主转向智力为主;由集体行动转向个体行动;由非积累性转向积累性;由多维度认识转向单一维度认识等等。即便是交流的功能,也由传统的、多维度、集体性、强关系的同辈群体转向了互联网中单一维度、个体性、弱关系的网络群体。表面上看,不同的人根据其喜好、网络行为的不同被归入一个个网络群体。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网络群体都是唯名的、没有实质性功能的社会群体,与现实中唯实的、具有现实社会功能的社会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面进一步的分析和数据中,我们将展示这种转变对于思维方式、讨论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4) 互联网媒体的扩张与膨胀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表达了作者对以电视为代表的新传媒工具的兴起和印刷术的衰落对人类认知方式产生的颠覆性影响的担忧。然而他当时显然不会料到互联网和以此为平台的新传媒方式的兴起。

时至今日,网络媒体的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将新闻产业化、标准化、流程化,以质量取胜的新闻工业模式,也可以被称为新浪模式;一种是借助产品带动新闻推广,以便捷

性取胜的腾讯模式；一种是以个人化的自媒体为主，以数量和细分市场取胜的自媒体模式。事实上，三种模式之间并非相互排斥，只是优势来源的差别。在三者中，目前发展的最好，最典型的新闻体制就是新浪为代表的新闻工业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以前，新闻往往是以“打包”的形式提供。受众和媒体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对每一条新闻的量化考评成为可能。对读者而言，新闻从“批发”转向“零售”，因此读者可以只选择自己喜欢看的新闻；而对于媒体而言，通过点击率、访问量考评具体每一条新闻的受欢迎程度也成为了可能，并催生出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量化考评机制与新闻工业流程。

在新闻工业下的网络新闻，追求快速、有趣、易读。快速意味着报道很难深入，以短评或简单地信息通报为主；有趣意味着原本枯燥复杂的新闻内容都要变得像娱乐新闻一样吸引眼球，因此必须突出新闻中那些怪异、非常、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东西，为此不惜扭曲新闻的本来面目；易读意味着必须进最大可能降低读者阅读时花费的精力。例如新浪网就要求，如果一则新闻有5个要点，那么就应当拆成5篇文章对外发布，并给每篇文章起一个醒目的标题。然而，这五篇文章的总和却不能等同于原先的一则新闻，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在不同要点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以上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新闻工业体制下，新闻报道的内涵在不断萎缩。

尽管新闻工业体制在商业和技术上取得了极大地成功，但是从社会化的角度上说，新闻工业体制下的新闻受众接受的信息高度简化并倾向于娱乐化，题材向政治、社会、娱乐角度倾斜——然而这种题材上的倾向并不会带来政治参与热情的提高，反而会使得政治题材本身也带有娱乐化的色彩，政治权威也随之降低。

（5）互联网中的群体特点

路径依赖。互联网虽然名义上是公开的，但用户由于自身的性格、兴趣、知识水平、人生阅历乃至经济水平等限制，被互联网分隔为不同的群体。加之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偏好和习惯，往往最终会倾向于接受固定网站、固定圈子的信息，进而形成路径依赖。

群体极化。这样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一般化的网络流行之外，具有特定爱好的小群体获得了抱团的可能性。这些群体的讨论不仅不对外公开，而且不同意一些讨论观点的成员还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这一群体。随着这一过程的演进，群体内部的意见也越来越倾向于一致。

阈值提高与认知失调。互联网的一个特点是放大变态、缩小常态。在新闻中能够引起热点关注的，永远是最特别、最猎奇、最极端、最醒目的内容。以外貌为例，网络中流传广泛的照片，绝大多数都是明星精心设计、后期处理之后的照片，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外貌水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网络的使用者却不自觉地以这些人为标准对比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这在学历、经济水平、个人经历等多方面普遍存在。在互联网上，我们被迫同时与极好的和极差的比较，似乎每个人都成了“平淡无奇”的一个人。因此，对于一个习惯了从网络中获取信息的人而言，长期处于“不如别人”的境地之中。

由此可见，除了自己所熟悉的信息来源之外，相当多的人对于网络中的信息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包括收到大量网络诈骗的影响）。因此，与传统的政治关怀不同，网络中的政治关怀往往局限于网上行动，而缺少现实行动的支撑。反映到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场景不仅大多和精彩的网络故事相比毫无新意，甚至没有网络中描述的激烈夸张，因而在大部分人已经处于弱政治关怀的环境下，互联网推动的“政治娱乐化”成为了大多数情况下低成本的首选。

四、 总结与讨论

本文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置于剧烈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以学业为中心的个人生活两个主要背景因素下展开讨论。我们认为，更倾向于内部归因、政治效能感偏低、发展

效能感较高的当代大学生在社会政治心态上表现出了弱政治关怀、娱乐化关注等特征。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娱乐化倾向，是大学生具有的弱政治关怀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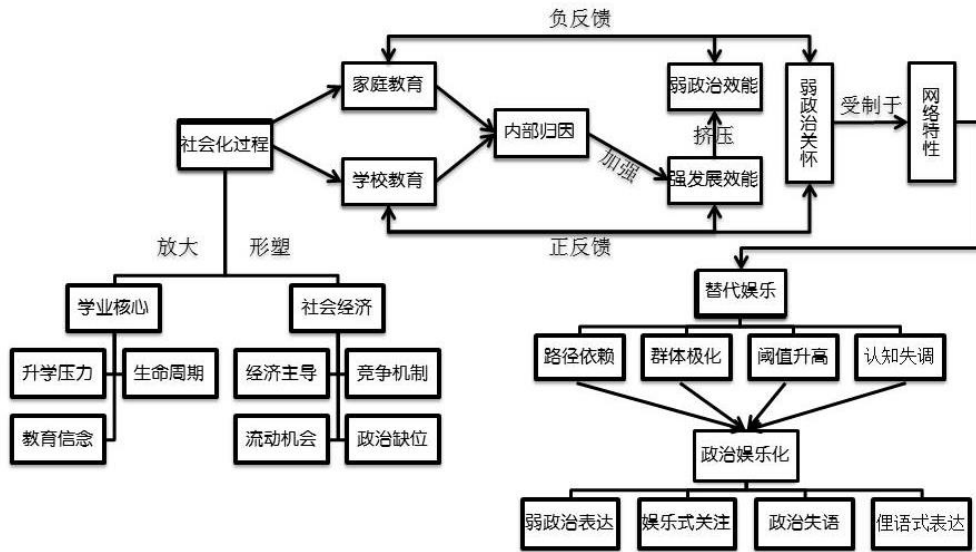


图3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框架示意图

1. 互联网时代“90后”的政治娱乐化与政治极化

(1) “90后”大学生是政治娱乐化还是政治极化？

对于“90后”世代的政治观，观察家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90后”世代高度现实主义，不相信理想，进而表现为政治冷漠；一种观点认为“90后”世代将政治作为娱乐，不尊重政治权威，表现为政治娱乐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教育水平和互联网的分化效应，“90后”世代表现出政治极化的特点。

事实上，这三种观点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描述了“90后”世代不同层次的特点。从最微观的层次上看，认为“90后”世代政治娱乐化显然有充分的理由。某地抓获贪官的新闻仿佛一则侦探小说，我们关注的不是背后的法理人情，而是在这过程中有多少贪官的绯闻艳遇、奢侈享乐、抓获过程的惊悚刺激、恶有恶报大快人心最后化作一段与女明星走光并列的网络新闻。可以说，政治新闻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使得政治前所未有地成为我们闲谈时的娱乐主题。

然而，在政治娱乐化的背景下，对于一些特定的问题，越来越根本性的、植根于价值观的观念分歧产生了。例如近些年来在网络中频繁爆发的对于雷锋、邱少云、黄继光真实性的争论，引经据典找资料、科学依据的往往是极少数精英分子，大多数的成员往往是选定立场之后决定言论。大量基于网络数据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网络用户的政治观点在快速分化为越来越少接触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阵营，徘徊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在迅速瓦解。

但在网络中喧嚣的政治讨论之外，是现实中政治参与每况愈下。事实上，极少有网络争论引发线下的政治行动。仅有的案例是前些年钓鱼岛争端时爆发的反日游行，即使在这些事件中，网络也很难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结果的角度上看，网络上政治话题的升温不带有带来政治参与，反而是普遍的政治冷漠。

(2) 权威瓦解与阴谋论泛滥

虽然网络并未带来政治参与的提高，却带来了一些一个意外的后果——传统的权威被瓦解了。权威的瓦解主要来自于两方面——权威的对抗与阴谋论。

通常来说，许多问题的讨论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背景，这是绝大多数新闻的受众所不具备的。然而，互联网使得这样高度专业的讨论被公开化，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时，经常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对于专家而言，可以依靠专业知识分辨不同观点的对错或利弊；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一个立场。然而，面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权威，大多数人不会像在线下一样接受权威的观点，而是在网络中寻找一个对立权威的观点，并加以选择地接受。例如一名专家对于转基因审批过程可靠性的质疑，可能会带来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彻底否定。在观点的对冲和网络大量真真假假的“学术丑闻”、“有良心的学者”的影响下，专家的权威衰落了。

网络信息往往纷繁复杂，往往对于同一件事情可以给出无数种解释。在所有的解释中，最受欢迎的往往是阴谋论的解释。例如，对于政府反腐的原因，网络中往往会归因于政治斗争；对于科学家推广转基因种子，会归因于商业公司乃至外国阴谋等等。

阴谋论的解释往往并没有任何证据，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实证的，不需要任何证据。这只是解释事情原因的一种路径，既不影响事件的内容，也不影响事件的结果。然而这种解释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任何权威的行为，都被解释为居心诡测。即使不能够有充足的论据否定专家的观点，也可以质疑专家的道德修养，进而否定专家的观点。普遍的阴谋论思维之下，网络中的理性讨论基础也逐渐瓦解了。

2. 政治娱乐化倾向下，谁将是经济长期停滞下的高危群体？

在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向上流动机会较多的前提下，年轻人相信个人努力并对个人成功怀有信心，致力于个人财富或社会地位的追求，此时不易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如果社会经济发展放缓，学生们也未必会马上发起学生运动，这是因为：

首先，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经济对他们来说是远景，学习才是近景。他们并不像港台或欧美的学生群体那样参与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将升学当作人力资本投资、将学校当作找工作的跳板。因此经济预期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像港台或欧美那么大。

其次，相对港台或欧美学生而言，中国学生具有内部归因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放缓幅度不大时，他们会优先将这些情况归因于自身的不够努力，而不会去责备制度性因素。

然而一旦社会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存在大量失业情况，年轻人的社会效能感就会大大受挫，此时年轻人就可能将矛头指向体制，将自己的失败和困境归因于体制性因素。并且，这种趋势将具有两个特点：

(1) “逆袭失效”：经济长期停滞中，“90后”可能最为危险

“90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仍然相信“努力就能成功”，草根创业的故事还历历在目，他们往往对依靠社会网络或家庭背景等途径所得到的“成功”嗤之以鼻。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变迁和高校扩招，纯粹的市场绩效主义有所减弱，学历等“硬指标”的含金量减弱，家庭背景、社会网络等因素又逐渐抬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社会经济结构不能再提供足够的升迁机会，导致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进一步上升，很可能导致冲突的爆发。

而在“00后”成长的年代里，财富积累已经逐渐完成，白手起家的例子越来越稀少。他们生活在追捧“富二代”、“官二代”的时代中，对先赋性作用的影响认识更深，相对更倾向外部归因，因此他们对社会经济发展停滞、流动机会下降的容忍度可能会更高。而且“开心就好”的家庭教育使得他们对于社会停滞的容忍度也可能更高。

换言之，“90后”至少部分地经历过较为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因此相对于“00后”而言更加敏感。所以，“00后”对于体制的不满可能是慢慢积累的，而“90后”对体制的不满则是瞬间爆发的。

因此，由于“90后”比较相信个人努力、并且内部归因，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短期停滞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不大，他们会从自身寻找原因；但是一旦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由于他们相信个人努力，反过来可能会认为现有体制不足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那么，由于经历过努

力就能成功的时代，长期经济停滞带来的先赋性因素主导会使“90后”的相对剥夺感反倒比“00后”更强，而“00后”则可能变得世故或愤世嫉俗，政治效能感很低。

(2) “中层溺水”：高不成低不就的二本、大专比一本、高职危险

这种趋势可能率先从二本、大专生开始，其中又以二本为最。这是因为：

首先，他们可能在这一过程中率先丢掉工作；

其次，相对于一本来说，他们容易把自身的失业问题归咎于制度性原因，这是由于自我归因偏见。“由于高考模式，成功进入较好大学的学生觉得自己是成功的，而且主要是通过个人努力（比如学习能力）成功的，他们因此会倾向于自我归因（这样归因对他们也有利）；而大专生或高职生是高考或中考的失败者，在别人看来也是学习能力差、不够努力的一群人，他们因此会倾向于归因外界，毕竟即使是差生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能力有缺陷。一直强化这种归因模式就会导致大专或高职生真的用这种角度去看待问题”；

第三，“中层溺水现象”：在二本和大专生中，二本面临着一本学生的同质化竞争并在竞争力上处于全面劣势。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像大专和高职院校毕业生那样具有一技之长，因而在就业市场上甚至反而不如大专高职种比较好的那群人。要知道，从分数线本身来看，二本院校的生源要比大专院校更好，这反过来会加深二本院校学生的不满。

处于互联网的“90后”大学生将在社会变迁中何去何从？他们弱政治关怀和政治娱乐化的特征是否还将继续？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而我们更期待社会对于这一代能从刻板印象式的批评转向更为积极的支持与鼓励，通过青年人激发出驱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 埃弗雷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 高仁、滕育栋：《从“政治娱乐化”现象看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构建》，《新闻传播》2014年第3期
- 李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 沈学琚：《基于PISA数据探究上海中学生学习时间的合理性》，《教育发展研究》2014年第4期
- 王威海、顾源：《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 肖莉：《当代大学生政治心态的特点及其原因》，《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第4期
- 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 姚本先、何军：《家庭因素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年第2期
- 袁潇、风笑天：《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 张树辉：《当代大学生政治冷漠现象探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 赵长胜：《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中的问题及对策探析》，《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